

歷史空間

關於錢鍾書與郭沫若

賀越明

大凡在兩位名人或要人之間加個「與」字做文章，不外乎兩種情形，一是鈎沉和梳理彼此的關係，或親或疏，或深或淺；二是評估並比較各自生前的事業成就、道德文章，以及身後的學術地位、社會影響，等等。可是，讀完謝冰先生的《錢鍾書與郭沫若》(載5月8日上海《東方早報·上海書評》，不僅於此兩層皆無所獲，反而陷入了「你不說我還明白，你一說我更糊塗了」的混沌境地。

錢鍾書與郭沫若有何關係？作者沒有舉出任何他們生前相識或交往的事實，唯一可說的是：「錢鍾書1949年後和郭沫若在同一單位供職，郭沫若是科學院院長，錢鍾書是科學院屬下的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以郭沫若當時的社會聲望，錢鍾書注意郭沫若的言行，在邏輯上，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但我們很少發現錢鍾書對他的直接評價。」如此說來，更可以推斷錢聽過郭在中科院大會上作報告，「在邏輯上」也算是「注意郭沫若的言行」，不僅「應當是沒有問題的」，簡直是順理成章而無可置疑。但問題在於：錢、郭之間這種似有實無的關係，有任何值得探究的學術價值嗎？不過謝冰提請「注意」錢鍾書與郭沫若的關係，是要發掘前者對後者的評價；直接評價「很少發現」，苦尋無着，那就找「間接的材料」。結果發現，錢鍾書的小說《圍城》有一處諷刺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挖苦「骨子裡只是個文人」的汪處厚時寫道：「棺材店和殯儀館只做新死人的生意，文人會向一年、幾年、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陳死人身上生髮。」《周年逝世紀念》和《三百年祭》，一樣的題目。」於是，他認為這個諷刺「也可以理解為是錢鍾書對一篇名文的態度，其中可能包含了他對文章作者人格和學術的評價，不知這個理解有無道理？」好不容易找到這點「可能」，如

獲至寶，卻又「不知這個理解有無道理？」顯見這個判斷底氣之不足。作家在文學作品中借他人酒杯，澆胸中塊壘，原本不足為奇，然細查提及「三百年祭」之處，諷刺意味卻不濃，至多諷而已。真要從這「微言」看出包含錢對郭「人格和學術的評價」之「大義」，非有驚人的想像力而不可得！

即便這一諷刺可以坐實，其中是否也該有是非之辨呢？謝冰在文中提到，「《甲申三百年祭》寫於1944年，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四天，並很快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曾被列為整風檔之一，在延安和當時共產黨控制地區大量發行。」何以故？作者未能陳述而卻是有必要闡明的。郭沫若撰寫《甲申三百年祭》，本是借明末政治腐敗導致民怨沸騰而終於傾覆的史事，揭露當時主政的國民黨貪污腐敗，喪失民心，必將重蹈明亡覆轍，同時也評析李自成領導農民武裝建立大順朝後很快土崩瓦解，其教訓在於驕傲輕敵和腐化享樂。毛澤東要求共產黨人在整風中認真學習該文，著重強調汲取李自成之敗的教訓，是借此向全黨敲響防止驕傲、保持廉潔的警鐘。作為一篇史論，其在學術上或有史料運用之瑕疵，史事分析之偏頗，但仍不失為一份有益的歷史教材，向革命黨提供了執政後可用以對照並警告自身的一面鏡子。如果不帶任何偏見，就應當承認「三百年祭」的鏡鑒意義多年來不曾消失，至今時今日則愈加重大。

除了這篇《錢鍾書與郭沫若》，謝冰還寫過錢鍾書與周氏兄弟、與陳寅恪、與徐志摩等文，莫不以錢氏之視角為視角，視之為臧否人物的標尺，這就難免局限於某種片面性。以《甲申三百年祭》而言，當年甫發表，即遭國民黨方面的各種報刊載文圍攻，均為指名道姓的責難和撻伐，相形之下，一部小說裡這點幾平難以察知的譏刺，對它可謂毫無影響。找出這個「間接的材料」來說事，既無貶低郭沫若之效，亦無抬高錢鍾書之力，連歷史「八卦」的斤兩都不夠，何言「包含」對郭之「人格和學術的評價」？

在現代史上，郭沫若既是涉獵極廣、成果豐碩的大文豪、大學者，更是富有詩人浪漫氣質的理想主義者，因而又是熱情投身於政治鬥爭、社會變革的時代弄潮兒，且是五十年代起擔任不少要職的國務院活動家，而錢鍾書固然是學富五車、博聞強識的大學者，還在晚年榮譽性地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但終其一生，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基本不脫亂世順民、盛世良民的軌跡，彼此各有其人生選擇，並無多少可比性。不知道作者對前者是否有關注和研究，倘若僅僅是表露某種譏刺或不滿，因各自的價值取向不同，也很難稱得上公允、持平。

奇怪的是，謝冰該文寫的是錢鍾書與郭沫若，又稱



從網上看到綠原的回憶文字，說是錢鍾書在批判胡風的運動中也寫了文章，刊登在《人民日報》上，「現在《人民日報》有電子版，如果要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想來不是太難，我沒有使用過電子版的《人民日報》，不知綠原的回憶是否有誤？」其實在北京《博覽群書》月刊2008年第11期上，就有吳永平的《綠原(幾次和錢鍾書先生萍水相逢) 失記考》一文，說他在圖書館花了三天時間查遍那一時期《人民日報》，沒有發現署名「錢鍾書」的文章，卻查到其弟錢鍾韓批判胡風之文，其中有綠原記得的「美蔣特務」一詞。可以說，「綠原的回憶是否有誤」的問題約兩年前已「徹底解決」，對涉及錢氏之細枝末節節節為意的謝冰何以寡聞如此？他對自己懸想的類似疑問，還在文中有所「請托」：「《容安館札記》中有沒有提到過郭沫若？我沒有細查，因為原書是手跡影印，一般的查閱很難發現，大連范旭倫先生專研此書，希望他以後能在这方面有所發現，或者他已有發現而我還沒有見到。」看起來，這像是只管「捕風」，懶得「捉影」了。

前些日子翻閱已故名記者曹聚仁的《採訪三記採訪新記》(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4月版)，看到記述共和國成立第五年的《「五年矣！」》中一段文字：「W君知道錢鍾書，那位學貫中西的文人，正在寫毛澤東傳，他很想知道，過去五年中，毛澤東的思想，其進步處何在？錢氏對這一方面，將如何交代？」迄今縈繞於心而未解：曹聚仁所寫是否確有其事？如果並非虛構(似無可能虛構)，能否說明其時錢鍾書崇敬執政黨領袖且有為之作傳的舉動(或是寫作計劃)？果真如此，不是與謝冰曾發掘的錢氏對毛澤東「大不敬」之言正相抵牾？那樣的話，豈不是也顛覆了錢氏多年來被稱道的孤傲、超然而不趨政治時髦的人格形象？可憾我非「錢學」專家，連研究者都靠不上，只得借用謝冰的那個請托之法：「希望他以後能在这方面有所發現，或者他已有發現而我還沒有見到。」慚愧，慚愧啊！

詩情畫意

劉再明

詩三首

(一) 華商報創刊七十周年 贈原華商報諸君

曾經救國急驅馳，大筆如椽破敵師；歲月崢嶸東逝水，諸君依舊鳳麟姿。

註釋：《華商報》——中國抗日戰爭及解放戰爭時期香港著名愛國報紙。1941年4月創刊，同年12月停刊，1946年1月復刊，1949年10月終刊。

(二) 參觀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 「南海一號」宋代沉船考古現場

當年遠渡重洋去，今日回歸故土來；絲路船沉千載事，須從水下盡翻開。

註釋：「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位於廣東陽江市海陵島十里銀灘，以「南海一號」宋代沉船之保護、開發、研究為主題，是世界首個水下考古專題博物館。



廣東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外景。 網上圖片

(三) 參觀陽江核電站

規模稱冠全中國，選址平安算萬年；展望大功告成日，光明更滿嶺南天。

註釋：「陽江核電站」位於廣東陽江市，是目前全國規模最大核電站。計劃2013年首台機組建成投入運行，2017年六台機組全部建成投產。

古今講台

吳羊壁

人可以成星

諸葛亮祈禳延壽不成，天上墜下了一顆大星，於是諸葛亮知道壽命已定不可改變了。這件事，在作為正史的《三國志·諸葛亮傳》中，並沒有記載。只說：「……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不過裴松之注文，往往圍繞一件事，引用了許多其他的記載，在諸葛亮卒這一部分，注文有：「《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又引：「《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這麼說，當時還真有這樣的傳說，可見古時人們是很相信天上的星辰與人間的大人物是有這樣直接的關係的。

這種星象與人間關係的學說(似乎還沒有出現這方面的專門著作)，不知最古出自何時。不過，就我們現在所見的中國古神話，大多是說人類創造萬物，包括天、地、人，而不是說另外有一個天帝創造世界。

在創造天、地、人的過程中，人也包括了創造星辰，在創造過程中，人與星辰可能就是共同的產物。《易·繫辭下傳》說：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氏是古代的聖人，也可能不是一個人，而是古時一個智慧的民族。他們開始觀察萬物(包括天、地、人)，希望能夠知道萬物運作的規律，並符合規律地行事。於是「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這樣就能夠有效地治理天下。他們創作了八卦，用來表達他們思考的天地萬物規律。那時人類文明水平還遠未能創作出文字，八卦以簡單的陰、陽符號，而變化組合出八卦以至進一步的六十四卦，表達的主要概念是：萬物既是變化的又有規律的。這裡面，他們觀察了天、地、萬物，在這個過程中，包括了天、地、人，自然也包括了星辰。星辰與人，在他們可能是等量齊觀的，或者在那時候起，就有了人與星辰相通的概念了。如果這個推想可以成立，那麼這種觀念起源就很古了。

還有一個關於傳說的故事，人與星更產生了直接的關係，《史記》與《莊子》中都記載了一個化星的人傳說。

殷代武丁(紂王之前)的時候，武丁夜裡夢見得到了一個極好的人才，叫做傅說。但在當時他的屬下中，沒有這樣一個人，於是到民間去找，在服役的囚徒中，找到了傅說，一見，武丁說：「是也。」與他談了之後，發覺果然是個大人才。於是，「舉以為相，股國大治」(《史記·股本紀》)。《莊子》上則記，傅說以正道輔助武丁之後：「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莊子·大宗師》)。這裡說到的星，都是二十八宿中的星。《莊子·大宗師》引崔譔的說法：「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托龍尾，……今尾上有傅說星。」原來言之鑿鑿，傅說成了二十八宿旁邊的一顆小星了。

但願有一天，人人都成了天上的列星，那時的世界一定更更好了。

亦有可聞

李恩柱

豆棚閒話

鼠與器

《小窗幽記》是明代的一部哲學火花集，裡面談到讀書，認為善讀書，就是在享人世間最大的清福，其中有一句話頗可玩味：「有資能讀，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是謂善讀書者。」「有資能讀」自然是具備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如此方能準確理解讀書中的義理，但是，為何又要「如不識字人」呢？其實這是提議在讀書時，應該持有一種「謙」和「虛」的心態。因為不少不讀書，常常帶有主觀成見，認為自己之前學到的知識，就是正確的。如此帶著事先形成的看法讀書，一旦發現書中所說與自己所知未能彼此印證，就會形成心理衝突，並由此加劇自己的主觀看法，對他人觀點嗤之以鼻，表示不屑或鄙視。這樣的讀書方式，有害無益。畢竟讀書是一種為求客觀了解的求知方式，如果存有先入之見，就很難與書做到相悅以解。而且心中的主觀成見愈深，受病也愈深。如果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加強事先形成的固有看法，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讀書之「謙」，是一種敬讓而不自大的心態。顏之推的《顏氏家訓》曰：「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仇讎，惡之如鴟鵂。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意指讀書的目的，在於求得學問上的長進，但是有人讀了幾十本書，就開始到處賣弄自己的一知半解，但求在長輩面前自負不凡，對同輩則輕視傲慢，不但不會增進知識，反會害了自己，還不如不學。其意就是倡導讀書要有謙遜的心態，切不可帶有主觀的先入之見，讀書時以一個障礙，自己才可能大權在握。然而，殺人雖易，但理由必須得當。究竟給袁世凱戴一頂什麼罪刑帽子，載灃花了些精力。原本想以貪污腐敗的罪名殺掉袁世凱，但覺得不可行。不論古今，殺掉一名經濟上存有嚴重問題的官員，必然牽連出眾多貪官，像奕劻這樣的元老重臣是躲不過的。讓人不能不思考的是，載灃的目標不是奕劻等臣子，豈可以因為一個袁世凱而毀了國家的棟樑？另外張之洞說：「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奕劻問道：「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這些都是實際問題，必須事前考慮清楚。想來想去，載灃將袁世凱貶回老家養「足疾」去了。

《小窗幽記》是明代的一部哲學火花集，裡面談到讀書，認為善讀書，就是在享人世間最大的清福，其中有一句話頗可玩味：「有資能讀，又涵養之，如不識字人，是謂善讀書者。」「有資能讀」自然是具備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如此方能準確理解讀書中的義理，但是，為何又要「如不識字人」呢？其實這是提議在讀書時，應該持有一種「謙」和「虛」的心態。因為不少不讀書，常常帶有主觀成見，認為自己之前學到的知識，就是正確的。如此帶著事先形成的看法讀書，一旦發現書中所說與自己所知未能彼此印證，就會形成心理衝突，並由此加劇自己的主觀看法，對他人觀點嗤之以鼻，表示不屑或鄙視。這樣的讀書方式，有害無益。畢竟讀書是一種為求客觀了解的求知方式，如果存有先入之見，就很難與書做到相悅以解。而且心中的主觀成見愈深，受病也愈深。如果讀書的目的，只是為了加強事先形成的固有看法，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至於讀書之「虛」，則是一種虛懷若谷、能夠包容不同觀點的開放性心態。東晉時期，高僧支遁講學，方式與其他學者迥異，其重點在於詮釋書中的精要義理，從不以形象直觀的比喻加以解說，而且在解釋一些章句時，經常會出現遺漏的情況。一些喜歡尋章摘句的人就懷疑支遁的學問，認為他是浪得虛名，盛名之下，卻無其實本領。支遁聽說了以後，卻很欣賞支遁，認為支遁是春秋時期善於相馬的九方皋，他的心思只在於怎樣找到千里馬，而不是去關注這匹馬的顏色是黑還是黃，是公還是母。這種能夠容納萬物的胸襟和氣度，也是讀書人應有的，如此在讀書時，方能接納不同的見解，即使觀點完全相左，也是站在理性的立場上進行探討，並能尊重這些不同的觀點。

袁世凱最為後人所詬病的是他稱帝。袁氏此舉讓世人心靈震撼不已，感到古老中國要跳出帝制的圈子頗為不易。其實，除去稱帝，袁世凱親歷的反腐也值得人深思。袁氏做了83天皇帝，就不得已宣佈取消帝制。細思袁氏此舉，超過古代帝王不少。畢竟是受過新事物薰染的政客。歷史上不少皇帝，反對聲此起彼伏，卻沒有一個辭職的，只有刀架在脖子上以後，裝出「禪讓」的樣子，極不情願的「讓賢」。而一些立場堅定的皇帝則肆無忌憚斂財、殺人，任大地流血漂橈，任生靈塗炭，等人家家用暴力掀翻皇椅才止住手。唐德剛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論及帝制運動時說：「袁公之不辛，是他原無做皇帝之實，卻背了個做皇帝之名。」這是濃縮、概括的話語，指袁世凱稱帝複雜的軌跡。《袁世凱評傳》把促成袁世凱稱帝者約略分成五種人：一為袁氏長子袁克定，意在獲立太子，膺承大統；二為清朝的舊官僚，意在爾公爾侯，謀求子孫榮爵；三為滿清的親臣，意在促使袁失敗，以復清之地步；四為副總統黎元洪之羽翼，意在陷袁於不義，希望黎得以繼任總統；五為日、英、俄三國，意在促中國於分崩離析，永陷貧弱落後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國之利益與東亞之霸權及瓜分中國的陰謀。用這段話為唐先生那句簡括之言作個註腳，也許不為不當。

袁氏稱帝，原因雖然複雜，癥結點恐怕還是唐德剛先生在《袁氏當國》中所分析的，即袁世凱「無心依法行事，放棄實權，實行真正的內閣制」。至於反腐那些事情，在剖析袁氏的文字中，佔有的份額並不大。雖然此事不稱帝重大，但與穩定相關，任何朝代，任何體制的社會都要做。不惟如此，從中也可以看出不同政治人物的措施。袁世凱在清朝和民國都曾與懲貪有所糾纏，官場的光怪陸離，不由讓人對官場的反腐俯首深思。1908年，光緒與慈禧先後去世。因為光緒帝無嗣，以載灃長子溥儀入嗣繼承皇位，是為宣統帝，載灃同時被授為監國攝政理朝政。此時的袁世凱位處軍機大臣，收買了不少朝廷重臣，比如奕劻。據說，載灃一直想謀殺袁世凱，一是為其兄光緒帝報仇，另一方面，作為攝政王，必須清除袁世凱這

個障礙，自己才可能大權在握。然而，殺人雖易，但理由必須得當。究竟給袁世凱戴一頂什麼罪刑帽子，載灃花了些精力。原本想以貪污腐敗的罪名殺掉袁世凱，但覺得不可行。不論古今，殺掉一名經濟上存有嚴重問題的官員，必然牽連出眾多貪官，像奕劻這樣的元老重臣是躲不過的。讓人不能不思考的是，載灃的目標不是奕劻等臣子，豈可以因為一個袁世凱而毀了國家的棟樑？另外張之洞說：「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奕劻問道：「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這些都是實際問題，必須事前考慮清楚。想來想去，載灃將袁世凱貶回老家養「足疾」去了。

有人說，載灃沒有殺掉袁世凱乃一大失誤。我們姑且不說袁世凱是不是貪污受賄，假如清朝沒了袁世凱，是否會建設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只以政客腐敗論，投鼠忌器是必然的心態，反腐常常被扭曲的心態所扭曲。民國建立，袁世凱成為第一任大總統。強幹奮發，勤於治事的袁氏，在治貪方面雖然沒有載灃投鼠忌器的困擾，卻有碎器震鼠、殺一儆百的「姿態病」。按當時《官吏犯贓治罪條例》，官吏不論大小，違法貪贓逾五百元，便可判處死刑。袁世凱王治警，就是因為一樁五百元(數字常有不同)的貪污案而被袁節令槍決。據說都肅政史查實證據後，上報總統袁世凱。三日內，從總統批准到大理寺審判、宣判、槍斃執行，王治警已命喪黃泉。

興育之主編的《中國二十世紀通鑿》曰，王治警曾就宋教仁遇刺一案代表總理趙秉鈞向在北京的中國國民黨人解釋。王氏有言，應桂馨曾與趙秉鈞商量暗殺宋教仁一事。「總理謂此事體大，我不敢主張，須問過總統。總理隨即對總統言，總統謂人之主張各不同，安可因主張不同，便謀害人，此事絕對不可，故總理亦絕對拒之，可見殺宋一事，總統決不知，總理決不負責。」又道，「殺宋決非總理，總理不能負責，此責自有其責。」是言一出，輿論大嘩。袁世凱暴跳如雷，說：「措辭太不檢點，王治警可惡！趙總理何以任其亂說？」懲治王治警，不單是個做姿態的問題，還有政治瓜葛。此類舊賬新賬一齊算的思路，對反腐力度絕對是自我諷刺。為敲山震虎，殺幾個撞在槍口上的貪官，已經與制度反腐相去遠矣，如果再摻以集團或個人利益，反腐云云，就只能惡性循環了。(識貪·之五)